

中国冤案大解密

伍子胥、文种、屈原、吴起、商鞅、桑弘羊、马援、邓艾、崔浩、嵇康、狐信、解、忌、寇准、范仲淹、岳飞、元丞相脱、李善长、冯胜、方孝孺、解缙、于谦、杨继盛、杨涟、袁崇焕、多尔袞、吕留良、岳钟琪……

袁文才、王佐、柳直荀、熊受暄、陈定侯、曾、许继、赖、段德昌、蔡申熙、旷继勋、余笃三、王炳南、胡风、俞平伯、彭德怀、贺龙、吴晗、陶铸、刘少奇、刘志新、聂树斌、余祥林、李树红、高莺莺、郝金安、赵作海……

全面揭示中华五千年历史中的冤假错案，还原历代冤魂以历史清白，还中华民族以善良人性。

中国冤案大解密

刘复之 编著

第四卷

中国古籍出版社



第四章 人民大会堂，面见康生进忠言

云南省委在夺权中瘫痪了——应召进京——面见康生进忠言——与“二月逆流”一脉相承

1967年1月，“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面夺权的阶段。

夺权，始于上海的“一月风暴”。1月4日，上海《文汇报》社的“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宣告接管了《文汇报》。第二天，即1月5日，《解放日报》社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也如法炮制，夺了报社的权。这一天，“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在“新生”的《文汇报》上发表了《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1月6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指挥下，“上工总司”等造反组织在上海广场召开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从而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1月8日，毛泽东对上海的夺权活动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他指出，“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响整个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1月9日，《人民日报》转载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了由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编者按。同一天，“上工总司”等三十二个造反组织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上发表了《紧急通告》，强烈反对当时盛行的挥霍国家财产、乱加工资、滥发补贴、强占公房等“经济主义”的表现。反对“经济主义”的歪风是对的，但“经济主义”之风始于江青，而《紧急通告》却倒打一耙，诬称上海市委在被打倒之际大搞经济主义，执行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月10日，毛泽东对《紧急通告》批示“很好”，要中央发贺电。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造反派发去贺电。贺电中“中央文革小组”的署名是毛泽东加上的。由此开始，“中央文革小组”与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并列。同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1月16日，毛泽东批准了上海市的夺权。这一天，《人民日报》刊登《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文章赞扬上海的夺权，号召“坚决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文章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

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文章是经毛泽东审定的。这是首次号召全国全面夺权。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震惊中外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称：

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

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向党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胜利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历史任务。

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这篇社论，向全国全世界表明：

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一场夺权斗争席卷全国；

造反派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夺权，而这两个概念又没有确切的含义，实际上只能是各级领导都被认为是走资派和顽固分子，统统被夺权；

夺权是一场“阶级斗争”，方式是激烈的，斗争将是你死我活的。

外界剧烈变化的形势，使躺在病床上的赵健民寝食不安。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他坚决要求出院。尽管秦基伟亲自派参谋长前来劝说，赵健民还是拄着双拐，戴着牵引，携着钢丝床，回到了省委书记处办公室。此时，一座办公楼，空荡荡的，四处贴满了造反的大字报。赵健民望着面前的这一切，一股难以言状的感情涌上心头。

阎红彦死后，被造反派称之为“云南的大党阀”、“阎老二”的省委书记处书记孙雨亭成为造反派攻击的首要目标。1月16日，造反派成立了“打倒孙雨亭联合作战部”；17日晚，召开了十万人的首次“打倒孙雨亭大会”。时隔五天，又召开了“打倒孙雨亭第二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没有提打倒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口号。因这一“原则”分歧，昆明地区的造反派正式分裂了。由“云南大学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组成了“新云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后来人们称之为“炮派”；由



“昆明工学院八二三战斗兵团”等组成了“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指挥部”，后来人们称之为“八二三派”。

在上海“一月风暴”的示范下，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夺权的浪潮迅速推进到边陲省份云南。所谓“大联合夺权”，指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所以，从一开始各派群众组织就各执己见，互不相让，都自认为是“革命造反派”，理应夺权；都排斥对方，并欲摧垮之，以至演出了夺权与反夺权的活剧。发展到后来，形成了两派大范围、大规模动用武力抢权，陷入了“内战”的境地。1月26日上午，“炮派”兵分两路，一路人马夺了省人委及所属各厅局的权，一路人马夺了省委和昆明市委的权。同日晚上，“八二三派”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十万人“大夺权誓师大会”。会后，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省委机关，当着周兴、赵健民的面，宣布夺权。

两大派组织重复夺省委的权，冲突就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伴随着愈来愈浓的夜色，两派之间“谁是真革命派”的大辩论也愈辩愈烈。

夺权！夺权！！夺权！！！在夺权声中，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委瘫痪了，云南全省各级党政机构瘫痪了。各级“走资派”在夺权中被斗争，被批判，被勒令交待问题，被体罚。戴高帽游街还算得上是较文明的，更严厉的是披麻衣、戴白袖套、染黑脸，沿街示众。解放十八年之后的云南大地，“旧”的政权在不情愿中塌台了，而“新”的政权在纷争中难产。社会，处在动乱之中。

然而，社会的管理不允许出现长时间的真空，现代社会尤其如此。2月10日，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省委常委刘林元，省监委副书记周力赴京，讨论云南形势，研究对策。两大派群众组织也分别推选代表赴京。抵京后，周恩来和陈伯达、康生、谢富治接见了他们。周恩来在接见两大派群众组织代表时说：对干部要区别对待，搞“三结合”，要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做自我批评；中央准备对云南实行军管，来帮助、推动实行大联合、“三结合”；革命造反派既要夺走资派的权，又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你们要搞归口联合。赵健民等来到北京后，住在京西宾馆。面对着造反派冲击党政军机关、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层层夺权导致社会动乱而忧心如焚的赵健民，出于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目的，在京期间主动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写信，要求当面汇报云南的情况。

2月28日晚饭后，康生、关锋到了京西宾馆。赵健民因外出，未能见到。当赵健民回到京西宾馆得知后，立即给康生处去了电话。康生处的一位姓张的秘书将赵健民接到了人民大会堂南侧的西会议室。张秘书告诉赵健民，康生正在接见西安来京的造反派，请赵等候。赵健民一个人在会议室中静静地等候着。安静的环境使他得以集中精力思考着要汇报的问题。当汇报方案逐渐形成后，赵似乎感到轻松了许多。这时，他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午夜十二点，1967年2月份即将成为历史。会议室内暖气

有点过热，赵健民感到头有些发昏，不知不觉地靠在沙发上睡着了。笔者不知道昏睡中的赵健民是否做过梦，是好梦还是噩梦。然而，这来临的3月的第一天，迎接他的将是厄运。

3月1日午夜一时许，精神抖擞的康生来到了会议室。醒来的赵健民赶忙汇报问题。开始谈话的节奏较慢。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了晚餐，康生边吃边听，赵健民也一块吃起晚餐，边吃边汇报。一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端坐在旁边，认真地做记录。赵健民在扼要地介绍了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如阎红彦之死、两派对立夺权等之后，集中地谈了三点意见。

赵健民说：“我们党的干部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完全符合实际的。”

康生轻轻地点了点头说：“是的。”

赵健民话锋一转：“但现在云南省和昆明的党政机关，普遍被夺权；领导干部，普遍被揪斗，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指示。”

赵健民停顿了片刻又慢慢地说：“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我们现在还在向造反派讲，可是没有人听。像这样搞文化大革命，是执行中的问题呀，还是理论不联系实际？”

康生注意听着赵健民后面这句话。

赵健民接着说：“文化大革命对干部打击面宽了。中央有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下面连支部书记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想不通。”

赵健民恳切地说：“对于主席关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指示，中央现在应该三令五申。”

在赵健民看来，他的这一意见是符合毛泽东的指示的，是正确的。几天之前，当他看到2月3日毛泽东与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巴卢库的谈话内容时，异常兴奋。毛泽东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你一切怀疑，你自己呢？你一切打倒，你自己呢？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但赵健民没有仔细品味毛泽东同时讲的另一段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露我们的黑暗面。”“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

在柔和的灯光下，赵健民继续反映着第二点意见。“现在搞大民主，是不是要搞这样大的民主？是不是可用多开党代会、七千人大会的形式？”“可能中央召开党代会



有困难，如外国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等，但省以下应多开党代会，使主要领导干部接受党员的监督。据我个人了解，山东、云南两省党代会开得就很少。这样，领导干部很难得到党员、群众的监督，所以文化大革命以来，很多书记就下不了台。”“今后省、县和基层应多开党代会，使领导干部经常受到监督。平日多发扬小民主，就不会积那么多意见，这样大民主一来，领导干部就不会下不了台。”

赵健民看康生没有什么异常反响，接着谈了第三点意见。

“前几天，我在昆明看到一份中央接待站答红卫兵问的传单，其中，中央接待站的同志说‘干部有错误就反对、批判，但对好的、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就应当拥护’。康老，这代表中央的意见吗？”

“代表。”康生应着。

“现在可不是这么做的。对于这个观点，中央只有三令五申，才能较好地贯彻。”

赵健民谈完了意见，感到浑身上下如释重负。这时，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手表，时针已指向夜间两点多了。

康生吃完夜餐后，似无睡意，他精神抖擞地问赵健民：“你知道什么叫文化大革命吗？”

并不理解的赵健民按照《十六条》空空洞洞地讲了自己的认识。

康生眨着眼睛说：“你那是一般性的理解。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康生呷了一口茶，按照他的逻辑阐述了起来：“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夕，刘少奇跑到刚刚解放了的天津，鼓吹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他有这样一条反革命的政治路线，还有一条为他的政治路线服务的组织路线。1936年刘少奇批准薄一波等六十一人从监狱中出来做我们的干部。现在查明，他们出狱时都发表了反共宣言，他们是叛徒。”

“文化大革命，就是要解决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不是过去那样一般的运动，过去的运动解决不了问题，解决不了刘少奇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六十一人的问题。”

很明显，康生这后面的一段话同毛泽东2月3日谈话的精神是一致的。

接着，康生像是反驳又像是开导似的说：“开不开党代会，这不在形式，而在内容。”

对于云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康生只是“要支持大联合”等一般性地讲了几句。

此时，赵健民注意到康生已没有多少话要讲了，时间也快五点钟，就起身告辞说：“请康老休息吧。康老，要注意保重身体。”



康生不阴不阳地答应着：“好，好。”

接见结束了。当赵健民走出人民大会堂时，一阵刺骨的寒风吹来，不禁浑身一颤。

赵健民哪里知道，就在他同康生谈话之时，中共高层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较量。较量的一方，后来被另一方诬称为“二月逆流”。而赵健民谈话的观点，同搞“二月逆流”的人的观点是那么相似。这就为他不久的将来埋下了“祸根”。

这是一次“不该”有的会见。

1966年底、1967年初的动乱和夺权，激起了中共高层部分人的强烈不满和异议。这些人起而抗争，他们是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会议上，一是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军委碰头会，二是2月11日和16日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问题主要集中在三点上：（一）“文革”要不要党的领导；（二）老干部应不应该都被打倒；（三）要不要稳定军队。

1967年1月，中央军委碰头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陈伯达、江青在会上要求军队立即开展“四大”，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叶群在会上点名攻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在萧华的家被抄后，陈伯达、江青、叶群继续纠缠萧华问题。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赞成陈伯达、江青的意见，认为军队必须保持稳定，不应开展“四大”，并对随意揪斗军队领导干部表示强烈愤慨。叶剑英盛怒之下，拍了桌子，造成右手第五掌骨远端骨折。后来，被称为“大闹京西宾馆”。

2月间，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再一次对“文革”发表了措词强烈的批评：

前一段，地方搞得很乱，我们部队有些单位也比较乱。要搞文化大革命，乱一点也没有什么要紧。但是在如何对待乱的问题上，我们和某些人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他们主张越乱越好，什么党、政府、军队，他们一概否定，都要推倒重来，说这是什么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夺权。我们的各级干部，他们加上走资派、黑帮、反动权威或其他什么罪名，企图一律加以打倒，说这才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怎么行呢？这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呢？……

叶剑英等人同陈伯达、江青等的斗争，在2月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达到了高峰。

2月11日，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怀仁堂召开，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会间，叶剑英质问陈伯达：

“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



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徐向前拍着桌子说：

“你们还要不要军队？如果不要，我就不干了。”

这时，康生不阴不阳地说：

“军队不是你徐向前的，你有什么了不起。”

叶剑英再次质问陈伯达：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这次会议，就在争论中结束了。

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又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了政治局碰头会。原订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讨论经济问题。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和谢富治、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

当谭震林与张春桥在怀仁堂门口相遇时，谭震林问张春桥：“陈丕显同志来了吗？”陈丕显是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由于夺权而受到强烈冲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接到北京，保护起来。张春桥回答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

走进会议室后，谭震林接着在门口时说的话大发雷霆：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阎红彦有什么罪，都给整死了！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说到激愤处，谭震林拿起文件，穿上衣服，要退出会场。他边走边说：“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这时，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余秋里拍着桌子发言：“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李先念说：从《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开始，那么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联，老干部统统打倒了。

你一句，我一句，对“文革”的批评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周恩来宣布散会。

这两次会议，后来被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核对了会议发言，王力记下了要点，然后向江青一

条一条地做了汇报。江青立即报告毛泽东，要毛泽东当晚接见张、姚、王。晚十时左右，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了张、姚、王，张春桥按照核对的要点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16日碰头会的第二天，余怒未消的谭震林又致信林彪，说：“他们根本不作阶级分析，手段毒辣是党内没有见过的。一句话，把一个人的政治生命送掉了，……老干部，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除了在军队的，住在中南海的，几乎都挨了斗，戴了高帽，坐了飞机，身体垮了，弄得妻离子散，倾家荡产的人不少，……我们被丑化到无以复加了。”林彪在谭震林的信上附上一信，说“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接信后，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2月18日深夜至19日拂晓，毛泽东召开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叶群（代表林彪）、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谢富治。除康生之外，“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没有出席。会上，毛泽东盛怒，他说：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五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小组，我就坚决反对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叶群同志，你告诉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稳定，有人要夺他的权，让他做好准备。又说：大闹怀仁堂，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让刘、邓上台。我同林彪同志、叶群同志南下，再上井冈山打游击。陈伯达、江青枪毙！康生充军！中央文革小组改组，陈毅当组长，谭震林当副组长，余秋里当组员。再不够，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力量还不够，请美国、苏联一块来。

最后，毛泽东说：我提议这件事政治局要开会讨论，一次不行就开两次，一个月不行就开两个月；政治局解决不了，就发动全体党员来解决。说罢，起而退场。

会议上，康生说：毛主席发怒了，是无产阶级之怒，是无产阶级的义愤！

2月28日，毛泽东在陈伯达送去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的现象，值得注意。

从2月25日到3月18日，中央多次开会批判进行抗争的老同志。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以“二月逆流”的罪名，在会上围攻批斗老同志。康生说：“这是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一次最严重的反党事件！”“这是一种政变的预演，一种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江青说：“你们的目的是想为刘少奇、邓小平翻案！”“保护老干部，就是保护一小撮叛徒、特务……”陈伯达说：“反对文化大革命，炮打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自上而下的复辟资本主义，这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历史已经证明，“二月逆流”，非逆流也，而是在历史长河的方向发生逆转时的正流。



赵健民与所谓搞“二月逆流”的老同志并没有联系，但他同这些老同志的观点一脉相承。赵健民哪里想到，当他向康生坦陈自己意见的时候，康生等“文革”大员们正在全力围攻所谓搞“二月逆流”的老同志；更没有想到，康生已经注意了他谈话的观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他步步逼来！



第五章 搏斗于险风恶浪之中

大联合：联而不合；三结合：勉强凑合；大批判：火上浇油——云南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陷入派性——“四二六”事件开武斗先例——北教场大规模武斗再起——风雨满春城——挺身而出，苦口婆心宣传大联合——康生京中施毒计——申明一个共产党人的观点：反对武斗——陷害，正暗中迫近——“八派”亮出了“打倒赵健民”的旗帜——进见谢富治、王力——武斗升级，“八派”、“炮派”决——死战——北京的关注——陷害，又上一个新台阶——忧心如焚，痛切建议——武斗，在高压下暂时沉寂

毛泽东为了顺利夺权，祭起了两大法宝，一日“大联合”，二日“三结合”。为了防止保守派夺权、假夺权、权力重新回到“走资派”手中，毛泽东在“大联合”前面加上了“无产阶级革命派”七个字，在“三结合”的前面加上了“革命”两个字。

当时，在“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一“最高指示”的指导下，在林彪“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一“次高指示”的诱引下，全国各地各派组织，都标榜自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左派”；都斥责对方是“保守派”，是“右派”，而且双方这种争斗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大联合”谈何容易。即使是迫于压力在表面上联合起来的，也是联而不合，内争不止。对立的双方，由于认识分歧、主张差异、利益得失，相互之间对立情绪日益严重，甚至结下了血海深仇。

“三结合”，即革命干部代表、军队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的结合。可是，谁是革命干部的代表？谁又不是革命干部的代表？应该结合谁？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在这一问题上，群众组织之间观点对立，军队代表也有自己的看法。哪一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哪一派又不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哪一派的代表进入权力机构？也没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干部对各派群众组织有自己的看法，军队代表也有自己的倾向性。军队代表之间，对于哪派是左派，哪个干部是革命的，也存有分歧，甚至严重的分歧。在这种背景下，“三结合”实在不易。有的结合起来，也是“三凑合”。

“大联合”、“三结合”不能顺利地实现，毛泽东只好依靠军队，对一些省、市、自治区实行军事管制；对一些省、市、自治区，指定以军队干部为主由若干人员组成



“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来实施对社会的临时管理。

1967年二三月间，全面夺权受到了严重挫折。毛泽东决定以“大批判”来促进“大联合”、“三结合”。“大批判”，就是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各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4月1日，《人民日报》转载了《红旗》杂志第五期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公开提出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这篇长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并批准发表的。自此，以批判“走资派”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为内容的“革命大批判”席卷神州。然而，这种“大批判”，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是打棍子、扣帽子，是政治围攻，是极“左”思潮的泛滥。它不但不能促进“大联合”和“三结合”，反而使群众组织把他们之间的派别斗争看成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而加剧了派别争斗。

3月间，由北京归来的云南两大派组织的代表，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实行“大联合”，成立了“归口大联合服务站”。但这个联合是违心的，是暂时的。这一月，中央为稳定西南边疆的局势，决定对云南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军事管制委员会，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李成芳任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子明、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黎锡福任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等为委员。这时，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已死；司令员秦基伟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被接到北京以治病为名保护起来，但由于林彪一伙的干扰，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

三四月间，省军管会的负责人参加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军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在打倒刘少奇，认清“文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分清“文革”的“主流和支流”等重大问题上统一军队高级干部的思想。3月9日，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1966年5月和1967年2月同外宾谈话的主要内容。毛泽东两次谈话的中心思想是：“文革”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3月9、10两日，陈伯达、康生在会上讲话。他们从历史到现实，就一系列重大问题污蔑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并传达了毛泽东批判《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的意见。康生首次批判了所谓“唯生产力论”。3月20日，林彪在会议上发表了极“左”的讲话，提出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著名论点，号召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它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在会议结束返回昆明后，倾向、支持“八派”的态度日渐明朗化。支持“八派”，就是压制“炮派”，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他陷进了“支派”的泥潭中。受到军管会支持的“八派”，本已膨胀的派性越发膨胀起来。他们从一派的利益出发，排挤、压制“炮派”，攻击持不同观点者。

4月18日下午，“八派”的昆明市公安局“八八红旗战斗队”负责人刘殷农贴出

了两张大字报，一张是《昆明市公安局八八战斗队向混入军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丁荣昌宣战》，另一张是《揪出丁荣昌的后台》。丁荣昌，是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这时正在昆明市公安局“支左”。在这两张大字报的刺激下，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炮派”则起来反对将打倒丁荣昌的大字报张贴街头，并把这一意见反映给省军管会。两派的矛盾激化了。

随着“八派”、“炮派”矛盾的激化，1967年4月26日，两大派发生了第一次武斗。后来人们称为“四二六”武斗事件。

4月26日，“炮派”在市内检阅台召开了名为“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并准备会后游行。大会举行前，邀请昆明地区各造反派组织参加大会，安排“八派”的代表上主席台、发言。“八派”没有派代表出席大会。他们认为，“炮派”的大会是收罗保守组织，公开制造分裂，是老保向造反派示威，决定冲击会场。中午时分，“八派”负责人黄兆其、杨树先前去省军管会汇报情况。省军管会一位副主任听完汇报后表示：“‘炮派’在检阅台开会是错误的，发生问题由他们负责。”一位省军管会联络员当场怂恿说：“炮派”的“四二六”大会是制造分裂、收买保守组织的大会，不能让大会开成。”两人作为军管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本应制止“八派”冲击会场，可非但不予制止，反而支持。晚八点十五分，“八派”以宣传车、载人大卡车为先导，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直向会场冲去。大会被迫中断，数万人在广场上和狭窄的东风路上展开了武斗。混战中，“炮派”负责人被绑架，许多人被打伤。“炮派”退出了会场，点燃起火炬举行了抗议“八派”冲击会场的大游行。“八派”沿途对游行队伍进行堵截。

“四二六”武斗事件，开了一个十分恶劣的先例。自此之后，云南全省武斗不断，连连升级，使社会陷入了动乱、恐怖之中。

5月28日、29日，昆明又发生了北教场大规模武斗事件。

5月26日，昆明机床厂“炮派”观点的群众庆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成立组织“五一兵团”，邀请同派观点的军医学校“联指”宣传队前来演出。军医学校的“八派”组织“红总”闻讯后，尾随“联指”到了机床厂，并同机床厂的同派观点的“‘一一·八’战斗兵团”联合起来，筹划冲击演出会场。当演出《火炬赞歌》时，“‘一一·八’战斗兵团”放开高音喇叭干扰，呼喊：“联匪滚出去！”“保皇兵滚他妈的蛋！”“红总”的人员也配合起哄：“鬼火舞！鬼火舞！”火炬是“炮派”的标志；《火炬赞歌》，是歌颂本派的。“八派”的标志是葵花。“‘一一·八’战斗兵团”和“红总”边哄闹边拥上舞台殴打演员，会场大乱，演出被迫停止。当“联指”的演出队退出会场上车回校时，“红总”已在厂门口用三辆大卡车横拦公路，设下路障。“红总”人员围着“联指”演出队进行谩骂、挑衅，



有的还放了演出队乘坐的汽车的轮胎气。“联指”演出队进退无路，整整被围困了一夜。

第二天，即27日，上午两派陆续调人员聚集在昆明机床厂，准备武斗。省军管会闻讯后，派人到现场做工作。“八派”的人员撤离，“联指”演出队返回学校。

机床厂事件，激起“联指”群众的愤怒。他们于28日下午在学校操场上召开声讨“红总”罪行大会。大会邀请昆明步兵学校的同派观点的“革联”参加。大会进行中，校外的地方“八派”组织配合校内“红总”冲进会场，殴打发言人。大会被迫转移到直供部礼堂继续进行。“八派”人员不罢休，跟到直供部礼堂继续挑衅。“联指”用长凳顶住礼堂大门，他们就扔石头、砖头，砸玻璃窗，双方攻守激烈。地方的“八派”集合了约三万多人，在黄兆其的指挥下，将礼堂团团困住，包围了一个通宵。

29日清晨，“八派”向“联指”发起攻击，一些人登上礼堂顶揭开瓦片，往里面撒石灰，投瓦片；一些人用电线杆撞门。礼堂大门终于被撞开了，“八派”人员蜂拥而入。“联指”寡不敌众，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抓到“八派”大本营昆明工学院关押起来，有的家也被抄了。武斗发生后，省军管会派执勤部队三百多人赶到现场，隔离了前来增援的“炮派”人员。“炮派”增援队伍抓了前去军医学校的“八派”负责人刘殷农等人，形势更为紧张。这时，军管会负责人到现场进行调解，要求双方撤离现场，放回被抓人员。经做工作，双方武斗人员散离，武斗平息。因军医学校设在昆明北教场，所以这次武斗又称为北教场武斗。

武斗平息了，但事情并没有完结。这次武斗，“炮派”组织被冲，多人被打伤抓走，吃了亏，满肚子的怒气未消。于是，在29日下午集队到昆明军区大门口静坐，要求军区“严惩打人凶手”！“炮派”群众的静坐，一直持续到6月3日才结束。

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十分关注昆明发生的大规模武斗，29日晚给昆明军区党委发去电报，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都不要介入昆明地区的两大派武斗，要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要求保持部队的稳定。

北教场武斗后，“八派”的涂晓雷在黄兆其授意下，毫无根据地编写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政治委员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文章，在昆明及外地广泛张贴、散发。7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又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文章，用完全捏造的材料诬陷张力雄、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5月29日晚举行军事政变，夺取省军管会的权。黄兆其、涂晓雷的文章，使本已动荡不已的昆明，更是满城风雨。显而易见，黄、涂的舆论宣传，离间了两级军区的关系，打击了云南省军区持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压制了“炮



派”群众。

赵健民从北京返回后不久，省军管会就正式成立，他出任省军管会工交办公室副主任。工交办改为工交组后，又任副组长。

赵健民面对着动乱的局势，遵照周恩来的指示，极力促进两派实行“大联合”。他认为，“大联合”可以结束动乱的局势。他到处宣传这样的观点：不论是“八派”，还是“炮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联合起来，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吃掉另一方。他苦口婆心地做两派负责人的工作。4月的一天，赵健民同“八派”负责人施志汝交换意见时，努力说服施志汝，对“炮派”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要实行“大联合”。施说：“我们同‘炮派’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赵说：“我不同意你这种看法。你们‘八派’有几万人，‘炮派’也有几万人，这其中的大多数都是学生和工人，怎么能说两派是敌我矛盾呢?!”施思索了片刻又说：“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赵说：“你们两大派都是几万人，当然难免混入少数的坏人。从这种情况说两种矛盾混在一起，我同意。但必须进一步说明，主要的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只有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才可能较好地解决少数坏人的问题。”施志汝由衷地点了点头。

4月上、中旬，赵健民眼看着“八派”、“炮派”联合不起来，而且矛盾不断激化，真是忧心如焚。他多次给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的秘书和昆明军区党委办公室主任去电话，要求面谈，但均无回音。一次，他与省军管会副主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张某某联系，要求面谈，但此人只是虚与委蛇。一心为了工作的赵健民哪里知道，这两人均已得到了康生的指示。

康生自3月1日同赵健民谈话之后，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赵健民“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赵健民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最高统帅那里挂上了号。当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在北京出席军以上干部会议时，康生亲自找到他专门谈赵健民问题。康生说：2月底，赵健民在北京开会时提出要找我谈话，我安排了时间。赵健民在谈话中，表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提出文化大革命是整老干部。康生特意指出：刘少奇出国访问路过昆明时，同赵健民谈过准备召开党的九大问题。对赵健民这个人，要有所警惕。康生在打倒刘少奇的浪潮正汹涌澎湃之时，指控赵健民与刘少奇有阴谋联系，不可谓不狠毒！

康生还嫌不够，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指示云南省军管会副主任张某某说：赵健民2月底找过我一次。他在谈话中讲了一些极为错误的言论。我对赵健民的讲话很气愤，已当面批评了他。你回去要把赵健民的这些错误转告云南的负责同志。康生还弦外有音地说：赵健民的这些思想不知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很值得注意。

省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回到昆明后，将康生关于赵健民问题的谈话精神进行了扩



散。4月下旬的一天，他对原省监委副书记周某说：“康老同赵健民谈话的情况你不知道？”当周某回答不知道时，他将赵健民找康生谈话和康生对赵健民的批评详细地讲了一遍。显然，这样扩散，是要陷赵健民于十分不利的境地。

4月23日，省军管会通知赵健民前去座谈。同去的还有原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周兴，原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三个人的发言总计不过三十分钟。这只是走过场而已。

赵健民眼看着两派矛盾不断激化，而自己又无能为力，十分焦急。当北教场大规模武斗发生后，赵健民深感问题严重，觉得自己身为高级干部、共产党员，需要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他立即连续写出了三张大字报，大字报的中心意思是，号召两大派“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立即停止武斗”，“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

就在赵健民对云南不断加剧的动乱忧心如焚之际，从暗中袭来的迫害正迅速逼近他。

6月初，原省监委副书记周某来到赵健民家里，对赵说：“听说康老批评了你，你的态度很不好。”赵理直气壮地回答：“我的态度不能说极好，也是很好。”周说：“你还是虚心一点吧！”赵严肃地回答：“一个党员给上级提了意见，就要批评，那还有什么民主。”周反唇相讥：“你的意见是与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违背的。”赵强硬地回敬了一句：“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周某从赵健民家中出来后，立即将与赵谈话的情况透露给省委机关的造反派。

这时，康生对赵健民的批评、指责以及赵健民的强硬态度，在云南逐渐由上层扩散到下层。陷赵健民于灾难中的毒网正在步步收紧。

6月的一天，云南省军管会某些负责人根据康生的旨意，搞出了一份机密材料《赵健民近况》，在军管会常委中传阅。通篇材料采用了歪曲、捏造的手法。材料中说，赵健民“说‘八派’不好”，“讲云南的走资派就是李成芳和秦基伟两人”。事实是，5月间，省军管会的几名工作人员（原省委组织部留下的待分配的大学生）到赵健民处闲聊，谈到“八派”和“炮派”中的两个小组织闹矛盾，一个组织抓了另一个组织的人，另一个组织就抄这个组织的办公室时，赵健民说：“‘炮派’不对，不应该抓人；‘八派’也不对，不应该抄家，激化矛盾。”其中的一个人将赵健民的谈话整理成材料送给军管会。军管会某些人在编写的《赵健民近况》第一期中，采用掐头去尾的方法称：“赵健民说‘八派’不好。”在《赵健民近况》第二期中捏造说：“赵健民讲云南的走资派就是李成芳和秦基伟两人。”实际上，赵健民同秦基伟关系一直很好，平日稍有闲暇，即在一起对弈；赵健民与李成芳也没有矛盾，只是对“文革”的看法有分歧。更为令人吃惊的是，军管会中有的人暗中将属于机密性质的《赵健民近况》插给了“八派”负责人黄兆其等。